



孙 玉 石 文 集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孙 玉 石 文 集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孙玉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孙玉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孙玉石文集)

ISBN 978-7-301-18009-9

I. ①我… II. 孙①… III. ①新诗-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324 号

书 名: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著作责任者: 孙玉石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09-9/I · 228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4.25 印张 35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关于殷夫笔名的一点辨正	
——读书札记	1
读《女神》随笔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小问题	5
读郭沫若的《论诗》通信	
——读书札记	12
年青的觉醒者的歌唱	
——《中国新诗发展史》之一节	20
被遗忘了的歌声	
——读艾青的两篇散文诗佚作	43
中国新旧诗之比论、融合与展望断想	49
历史已经预言了未来	72
寻梦的回响：东方民族的现代诗	76
何其芳的《岁暮怀人》及一组佚诗	80
夏夜之梦的微笑	
——由新发现的何其芳两首爱情诗谈起	94
新诗与传统关系断想	100
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104
艾青两首佚诗及发现小忆	
——读书札记	116
诗人想象与学者情怀	
——《死水·神话与诗》导读	124

附:关于《死水·神话与诗》的访谈摘录	157
冯雪峰的珍贵佚诗《呼唤》及《文学修养》杂志	160
附:《文学修养》月刊目录	173
新诗的诞生及其传统漫言	
——为新诗诞生 90 周年作	179
中国现代诗歌与北京大学之联系	
——写于新诗诞生 90 周年	186
何时成为一匹有野性而又聪慧的狼呢?	
——新诗流派与诗学批评发展断想	190
现代向传统的寻求:1930 年代废名关于“晚唐诗热”的阐释	
——在吉林大学文化研究所的讲演	196
1920 年代中国新诗发展述略	
——五四以来新诗发展史综论之一	213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中国新诗总系·30 年代卷》导言	233
附:民族抗战的号角——“新诗发展概况”之四	301
附:《现代》杂志诗歌研究资料目录	316
一首永远“未完成”的交响曲	
——1999 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致词	324
新的冲刺 新的突围	
——2004 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332
零星的感想和“多余的话”	
——为闻一多诞辰 110 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致辞	341
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校勘录	348
为中国新诗的真正辉煌	
——中国新诗百年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351
百年新诗创作和研究的反思与突进	
——2006 年两岸四地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355
诗歌能为民族灵魂的铸造多做点什么?	
——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361

永远与光明的搏取者们同一呼吸	
——为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的致辞	363
意见与感想	366
致木斧、杜谷的信	369
流自心底的阳光	
——与几位现代诗人的对话	371
中文系大学生百部阅读书目导读	377
《女神》导读	
《新月诗选》导读	
《艾青诗选》导读	
《现代派诗选》导读	

关于殷夫笔名的一点辨正

——读书札记

关于殷夫生平的记载,最早见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第一卷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中的《被难同志传略》。在殷夫的小传里,关于他的姓氏与笔名这样说:“殷夫,一名白莽;并常用文雄白、莎菲、洛夫等笔名;姓徐。”这里,除了殷夫、白莽两个当时为人熟知的笔名以外,还介绍了几个人们不知道的笔名。但是关于他本来的名字,却只知道姓徐,不知道叫什么。到了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里,才说他“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此后一般现代文学史或有关论文,都沿用这个说法,认为殷夫“原姓徐名白”。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同志对这个看法提出怀疑。据瞿光熙同志托人向殷夫亲属询问,得知殷夫在家名徐柏庭,读书时名徐祖华。^①徐白应该是殷夫后来从事革命斗争、编辑革命刊物时的化名之一。他在当时参加编辑的党的地下刊物《列宁青年》上,就曾用徐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政论和翻译。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还未解决:一,徐祖华到底是殷夫什么时候用的名字呢?据瞿光熙同志说,他曾经查阅过与殷夫在上海读书时有关的几个学校的刊物、文件,都未发现徐祖华的名字。那么,殷夫在上海一段时期里究竟用的什么名字呢?二,《前哨》殷夫小传里说殷夫“曾用文雄白、莎菲、洛夫等笔名”,其中用“文雄白”与“洛夫”两个笔名的作品迄今尚未发现,这两个究竟是不是殷夫的笔名呢?

近日翻阅早期的革命文学刊物,在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月刊

^① 见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一书,第206页。

第三号的《读者的回声》里,看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内容和署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编者给这封信加了个“被奥伏赫变的话”的标题。先将原信抄录于此:

编者:

文化批判使我兴奋,真的。

有一些小意见写在下面:

一月号的十七页上“批判不仅是解剖刀乃是一种武器(Kritik ist kein anatomisches Messer, sie ist eine Waffe)”这句内的“仅”字大约是作者的笔误,这是应该删去的。因为“不仅是”和“不是”显然不同的。要是照“不仅是”的一句话,则说“批判是解剖刀,同时也是武器”。但是照第二句呢,则说“批判只是一种武器,并不是解剖刀”。

而“Kein anatomisches Messer”似乎应该译作“不是解剖刀”的。

你们觉得我的意见对不对?

同书里二十四页“Die Philosophie keunr sich nicht verwirklichen ohne die aufhebung des Proletariato……”作者译作“不把普罗列塔利亚特‘奥伏赫变’,哲学决不能实现”。

在此我们很容易看出(照中文看)Proletariat 是被 aufheben 的。

同时在《创造月刊》九期成仿吾先生有几句话:

“……我们在以一个将被‘aufheben’的阶级为主体……”

依他的语气,似是说 Porgeoisie 是被 aufheben 的。

于是我发生些疑心请你们指教。

我是一个刚学半年德文的学生,错误怕所难免,祝努力。

徐文雄于同济

从信的内容和署名,再根据殷夫传记记载的材料,我断定这封信乃是出于殷夫的手笔,徐文雄应当是殷夫这时候在上海读书时所用的名字。^①

^① 本文写成后,读到了景唐同志的《殷夫烈士的一些新史料》一文(载《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该文通过确凿的材料,证实了殷夫在同济大学德文专修科读书时所用的名字为徐文雄。

确认徐文雄是殷夫当时所用的名字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前面提出的第二个疑难问题,即:殷夫小传里说的“文雄白”是不是殷夫的笔名呢?我认为小传里的“文雄白”并非殷夫的笔名,而应当是“文雄”和“白”两个名字,由于排印的错误而合在一起了,后来的人未能辨证,也就一直辗转相引,沿用无疑。首先,这种排印上的错误是可能的。当时由于环境的压迫,印刷及技术条件很差,《前哨》上的错误是很多的。由于疏忽把“文雄、白”排成“文雄白”是可能的。其次,之所以这样推断的更主要的理由还是,在《前哨》的殷夫小传里记载,殷夫当时“将美丽的抒情诗,投寄给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奔流》等。而红色鼓动诗则投给秘密发行的工人运动刊物如《列宁青年》等。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这期间中,因为他做了更多的工作,同时也学习了更多,所以除写诗以外,还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青年工人运动的论文,登在工人运动刊物上,这是很少人知道的……”从这段话看来,可以断定这个传略的执笔者对殷夫的革命活动是很熟悉的,他当然知道殷夫曾经在《摩登青年》、《列宁青年》等“工人运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可能是由于这些杂志在当时还是秘密刊物,不便于公开的缘故,所以才没有直接写入传记。这些文章,除了用殷夫的笔名以外,还较多的用“徐白”、“沙洛”、“殷孚”、“莎菲”等笔名。殷夫从1930年下半年起主编《列宁青年》,写的一些前言后记,就是用“徐白”署名的。《前哨》殷夫小传的执笔者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殷夫用过“徐白”这个笔名,事实上,小传里已经提到“莎菲”这个笔名,就证明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可是小传里只提“莎菲”而无“徐白”。这是不可理解的。倘若把小传里的“文雄白”分开,一个为“文雄”,一个为“白”,那这个疑难就迎刃而解了。而这个“文雄”,就是这封信里署名的徐文雄。

依据上述理由,我认为《文化批判》上的这封信为殷夫在同济大学德文专修科读书时所写,徐文雄应当是他这时候所用的本来的名字。查过一些当时的革命文艺刊物,都未见用徐文雄的笔名发表的作品,《前哨》殷夫小传里说常用“文雄白”等笔名,可能是将他的名字当成笔名了。至于小传里提到的“洛夫”这个笔名,是不是《列宁青年》上殷夫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所用的“沙洛”笔名之误,或者另有所据,没有材料证明,就不敢妄加推断了。

上述意见是否正确,希望同志们指正。

1963 年 1 月

(原载上海《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63 年第 3 期)

读《女神》随笔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小问题

我爱读《女神》，也爱读关于《女神》的评论。

但是，读建国以来直至今天的许多有关评论《女神》的文章、专著，以及文学史的有关章节，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在论述《女神》所表现的反抗黑暗现实的叛逆精神和向往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往往都举出《匪徒颂》和《巨炮之教训》两首诗作为重要例证，然而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摘引经郭沫若 1928 年修改过、后收入《沫若文集》的诗句，而不是按照初版《女神》中作品原来的面貌，并以后来改过的作品作为论述郭沫若五四时期思想的重要依据。例如臧克家同志 1953 年写的《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一文，论述《女神》表现的叛逆反抗精神时，举《匪徒颂》为例，说诗人歌颂了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匪徒们”，向他们三呼“万岁”，“在他所歌颂的这些革命人物中，就有‘饿不死的马克思’、‘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和‘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第 47 页）。后一年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又说：郭沫若当时“接触了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匪徒颂》里歌颂了政治革命的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新诗选》第 8 页）。1957 年，张光年同志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那篇著名论文中，谈及《匪徒颂》时说：“在这首诗里，歌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三个‘亘古的大盗’”，又说，在《巨炮之教训》中，“诗人听到列宁的呼声：‘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诗刊》1957 年创刊号）这些诗句，又都作为论述十月革命给予诗人精神上的冲击的部分例证。这些论述，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此后的一些论文和现代文学史，皆依据《沫若文集》和以上这些论

述,辗转相袭,重复引述。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有的文章,一仍其旧,继续沿袭了这个毛病。

原来的作品究竟怎样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首诗的修改情况吧。

《匪徒颂》,约写于1919年末,最初发表在1920年1月23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巨炮之教训》写于1920年4月18日,发表在同年4月27日《学灯》上。这两首诗,后来收入《女神》时,除个别字句外,未作大的改动。

《女神》,1921年8月出版。初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收56首诗,加《序诗》共57首。其中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三篇诗剧。1928年初,作者将自己早期的诗集《女神》、《星空》等,抽去《星空》中的戏曲、散文,重编为《沫若诗集》,于这一年6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印行。其中一些诗做了比较重要的修改。如《凤凰涅槃》由原来的三百八十多行删削浓缩为二百四十余行。《匪徒颂》、《巨炮之教训》个别诗句作了重要改动。删去了《无烟煤》、《太阳礼赞》、《沙上的脚印》三首。1957年出版的《沫若文集》中的《女神》部分,即根据1928年修改过的《沫若诗集》,又经作者修订后编入的。删去的三首诗,又复补入。《匪徒颂》和《巨炮之教训》经常被引用的两节诗,恰恰是作者作了重大修改的地方。

这里,我们将这两节诗的原作和修改后的情况,分别抄录如下:

《匪徒颂》第二节原诗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庾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到1928年的《沫若诗集》中,这节诗改为:

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巨炮之教训》第十节原诗为：

“同胞！同胞！同胞！”
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酣叫，
“为自由而战哟！
为人道而战哟！
为正义而战哟！
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
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
同胞！同胞！同胞！……”
他这霹雳的几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到 1928 年的《沫若诗集》中，这节诗改成这样了：

“同胞！同胞！同胞！”
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酣叫，
“为阶级消灭而战哟！
为民族解放而战哟！
为社会改造而战哟！
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
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
同胞！同胞！同胞！……”
他这霹雳的几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事实很显然，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在《匪徒颂》一诗中，歌颂的社会革命的“匪徒”，确实有“亘古的大盗，实行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但却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罗素和优生学家哥尔栋。在《巨炮之教训》中，诗人确实是以列宁倡导的革命斗争的学说批判了托尔斯泰鼓吹的“克己无抗”的信条，表现了对工农“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的热烈赞美，对革命“最终的胜利”的坚定信念。但是，当时诗人在列宁的“酣叫”声中，听到的不是“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这样的具有阶级斗争的热切呼声，而是“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这样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战斗口号。

应该说，原作中的一些诗句，是符合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的。《匪徒颂》和《巨炮之教训》均写于1919年底至1920年春天。这时，十月革命的伟大曙光照进了黑暗沉沉的中国，激发着诗人向往社会主义理想和反抗黑暗现实的澎湃激情。五四运动和新文化革命的汹涌洪流，激荡着诗人火山爆发一般的革命情感。诗人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喷发。他自己把这种激情叫做“诗的意趣”的“神经性的发作”。“在民七民八之交，那种发作时时来袭我，一来袭我，我便和扶着乩笔的人一样，便写起诗来，有时连写也来不及。”（《我的作诗经过》，1936年《质文》第2卷第2期）诗人这两首“诗的创作爆发期”的作品，分明带着狂飚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刻烙印。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诗人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是十分朦胧的。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这正如诗人在《女神》“序诗”中这样宣称：“我是一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可是后来作者自己也承认，当时自己“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明白”（《革命春秋》第140页）。他还分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代表人物；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标榜的漂亮口号。这样，他在《匪徒颂》中，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一并

作为“社会革命的匪徒”加以歌颂，在《巨炮之教训》中，像“霹雳”一样把他从梦中惊醒的列宁的叫声，竟会是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讴歌罗素，讴歌哥尔栋，并不奇怪。罗素，是现代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力宣传和平主义，反对英国参战。1916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为不肯当兵而无辜获罪者辩护。当时的反强迫征兵同志会曾予散发，未署名，有六人因此被罚作苦役。罗素因而致函《泰晤士报》自认，遂被传审定罪。他不肯出金自赎，认了61天的徒刑，并被剥夺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原理的讲席。他不畏强权，更加卖力地鼓吹社会改造的理论，引起了政府恐慌，终于1918年四月被下狱监禁六个月。他鼓吹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造学说和这些不顺时俗的反战行动，在五四前后曾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对此，郭沫若是有所耳闻的。他在欧战结束后，访苏联，来中国，进行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那是写这首诗以后的事了。哥尔栋，通译高尔顿，是英国遗传学家，达尔文的表弟。他在遗传学中导入数学的方法，是生物统计学、人类遗传学及资产阶级优生学的创始者。他的人类天赋才能等级学说，后来被反动派利用，成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推行种族歧视和侵略政策的理论根据。他的优生学理论和生物统计学说，当时影响颇大。此时郭沫若正在日本学医。他接触并对这种被视为“妖言惑众”的学说加以讴歌，也是正常的事情。当时反动势力诬蔑一切新的学说的倡导者为“邪说异端”，为“匪徒大盗”。郭沫若对此无比愤怒。他以不羁传统的束缚和不畏强暴的威压的彻底的叛逆精神，向反动势力的谩骂攻击大胆挑战。面对反动派把“身行五抢六夺，口读忠孝节义”的“假匪徒”奉为“军神武圣的标本”，他反其道而行之，带着怒不可遏的狂暴感情，“将古今中外底真正的匪徒们来赞美一番”（《匪徒颂》小序）。这种叛逆的精神，包含着郁积已久的阶级的愤懑，民族的愤懑，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其势如火山爆发，火光与灰石纷飞；如滔滔江河，大浪与泥沙俱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良莠不分，进步的科学革命学说，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代表人物和没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混在一起。他歌颂了克伦威尔、华盛顿，歌颂了哥白尼、达

尔文,歌颂了释迦牟尼、马丁·路德,也歌颂了“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这样,他把资产阶级哲学家“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庾而不死的罗素”和“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放在一起歌颂,他用列宁的以革命斗争方法实现工农最高理想的道路批判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卑污说教时,让列宁喊出了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的声浪,都是毫不足怪的。郭沫若当时的思想仍属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范畴。他思想中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因素。看来是多么矛盾,可又是多么真实!这种矛盾,这种真实,恰好反映了诗人在“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中,那种反抗一切因袭的旧传统、痛斥一切反动的旧势力的铮铮硬骨,也流露了诗人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这种矛盾状况,是五四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主将和旗手鲁迅,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新世纪的曙光”,开始用“新的武器和新的装束”进行战斗的同时,仍然有时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战斗的武器,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尼采思想也曾被拿来当做射向封建营垒的投枪。郭沫若两首诗中的那种复杂矛盾,正是这种时代的社会思潮复杂矛盾状况的深刻反映。

郭老不愧是一个紧跟时代脚步不断前进的伟大战士和诗人。他对艺术精益求精,对读者极端负责。他同革命,同人民始终共同着脉搏。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投身阶级斗争的风雨,他的思想在1927年前后,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逐步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诗人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斗士。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血雨腥风弥漫的上海,在被迫离沪赴日的前夕,仍然不畏黑暗,坚持战斗,除了写了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诗篇《前茅》的《序诗》和诗集《恢复》以外,还重编修订了《女神》等早期诗集。他正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新的认识,对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无比崇敬,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深沉义愤,从对读者负责的严肃态度出发,在1928年初重编诗集时,对《匪徒颂》、《巨炮之教训》的部分诗句作了重要修改。这是完全必要的。从这些修改中,我们看到了诗人思想飞跃的鲜明足迹,看到了

诗人“甘心附逆”无产阶级革命的矢志忠心,看到了诗人为实现工农最高理想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心。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是允许的。据此研究作者思想发展的足迹,也是必要的。但是,依据作者多年后修改过的作品来论述他原来的思想状况,就不能不说是研究评论中的一点微疵了。

许多有关《女神》评论中的这一毛病,只是白璧微瑕。但是,它却给我们提出了关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小问题,这就是:研究一部作品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是依据原来作品的面貌,还是根据作者多年后修改了的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要不要翻阅一些原版书、旧期刊,看一看一些作家作品的原来面貌?我认为,多看一点原始的材料,多翻一点当时的期刊,依据作者原来作品的面貌评价作家当时的思想,对比作者修改作品的情况探求作家前进的踪迹,这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

(原载《文学评论》丛刊第2辑,1979年2月)